

唐继尧政府财政与富滇银行的关系探析

<http://www.criifs.org.cn> 2009年6月10日 史 允

摘 要：富滇银行是云南近代最主要的银行，是唐继尧政府时期云南唯一的货币发行银行，因而是完全由政府主管的官办银行，富滇银行的金融行为与唐继尧政府的财政联系紧密，一荣俱荣，一毁俱毁。这样的制度设计的确曾经帮助当时的云南财政解决了匮乏问题，然而，一旦遇到金融风险，捆绑经营的财政和金融就难免相互影响，两败俱伤。20世纪20年代，云南曾经的一场金融危机就是财政与金融相互牵连而导致的，其结果是唐继尧政府倒台，富滇银行也面临倒闭或是改组。

关键词：金融；财政；货币发行；金融危机

富滇银行是云南近代最主要的银行，“本省金融以富滇新银行为枢纽，如发行纸币、管理外汇、划一币制、扶持农工商矿各种生产事业，多系由富滇新银行办理”[1]。但是富滇银行不是普通的商业银行，它从诞生之时就与财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政府的银行

1911年11月，云南重九起义之后，新成立的财政、实业两司向刚刚成立的云南军都督府请示，两司希望成立个“公钱局”：“窃维立国以军事为先，用兵以筹饷为先。滇本瘠区，平日已赖协饷，反正以后，需用尤繁，又兼汇兑不灵，银根奇紧，市面恐慌，日甚一日……非速设特别机关以维持一切，断不足以变通而维市面。本司等再四筹维，于财政困难之时，……发行银钱纸币，并赶铸铜元，所有通省前令厘税，均可用此币缴纳，务使三迤通行，毫无阻滞。”[2]。

成立公钱局的构想源于刚刚获得军事胜利的省政府财政上的匮乏，云南在清末已经发行设立过大清银行，少量地发行过铸币和纸币，营业的情况很好，大清银行云南分行“初基金不过百万元，后存款渐多，营业日盛”[3]。同时，云南也因此拥有自己的造币厂。在这样的情况下，成立一个公钱局，不过是把大清银行云南分行的业务继续下去，并且，原来银行的一切盈利空间就将转归新政权的新银行。

富滇银行在成立之初完全是由政府出资的。当银行刚刚宣告成立，财政、实业两司向都督府请示，请派遣执掌富滇银行的“局长、付局长”，而都督府复函道：“现据该司等呈复，请以公钱局名称改为富滇银行，并请委派局长、付局长前来。查该银行既系滇省自行筹办，既定名为富滇银行，至公钱局名称已改，则局长、付局长之名，亦未便沿用，应改称总协理，所请委充正局长黄凤祥改充银行总理；付局长之解永嘉改充协理。……等因奉此，合行札知”[4]。由此可见，富滇银行实质上即是军政府的一个部门，银行总理、协理，不过是原来的局长、付局长改了称谓，是由军政府指派的。并且在银行成立时公布的章程中也明确了银行的资本完全由政府俭出，利润归公，负责人由政府派出，并对政府负责：“第四资本：本银行定资本为一百万元，除由财政、实业两司自筹外，如

有不敷，由两司担任，向铁路公司以六厘年息借款办理；……第十三红利：本银行每年营业除利息及开支外，如有红利，分为二十成，四成作为公积，二成作为行中职员等奖励，……余十四成概行归公充饷；……第十六职员：本银行设总理一人协理一人，均由财政、实业两司详请军都督府委派；……第十八结算：本银行一切账目一年结算一次。凡盈亏状况务详细报告军都督府及财政、实业两司查核。” [5] 初始的启动资金来自财政、实业两司，而此后的运营资金也主要来自政府收入，民国三年，云南省垦殖局致函富滇银行，称“查辛亥、壬子两年援川军队回滇，先后解交司库渝、泸、叙协滇军饷银四十万两，分别由司库核收，嗣因富滇银行扩充分行，应备基本金。即经飭司陆续拨交银行各在案” [6]。可见，富滇银行后来用于扩充分行的资金是来自军政府对外战争时的所得。垦殖局致函富滇银行的意图是，财政厅又将这笔款项拨给垦殖局“筹办垦殖水利”，而既然财政厅已做了决定，富滇银行即于半个月后，将四十万两白银提出交给垦殖局 [7]。富滇银行当时的总资产不过一百多万，转移资产的40%，只需区区一纸文书，可见富滇银行是谁的银行。

二、依赖财政而发展

在富滇银行产生之时，在云南的经济领域，为其留下的获利空间已经很有限了。东方汇理银行把持蒙自，占据大锡出口、以及滇越铁路之利；而云南传统的票号和钱庄的势力也很强。当时，国内像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这样的华资银行也面临这样的困境，他们的办法是向政府放债，“公债的折扣、利息等极大，从而为本来资金出路有限的国内商业银行界提供了一条牟利的捷径” [8]；这种借款利息颇厚，甚至向其他银行借贷，再转借政府也能获利：“近日各小银行、银号，向外国银行接洽押款甚多，行息一分五。但转借政府，可得净利四分” [9]。但是，富滇银行却不能这样，富滇银行是全资政府所有的，当财政遇到困难当然要向其借款，但却决不会给予什么折扣，或利息。这就像一个人的左手向右手借钱，右手怎么会要求高额利息，而左手又怎么会给呢？没有了公债发行的利润，富滇银行所依赖的是货币发行之利。因特许货币发行而使政府获得的利润在经济学中称之为“铸币税”，《牛津英语字典》将铸币税解释为“由于铸造货币所征收的税收，包括铸造费以及统治者凭借其至高无上的权力而要求的归政府所有的收入” [10]。为什么

铸币税是“凭借至高无上的权利要求”的？这是因为统治者可以以任意含量的贵金属铸币，并且强令此种铸币为某个价格。比如，1918年，护国成功，新铸“拥护共和纪念”半开银币“重26.8克，成色88%，币背为‘拥护共和纪念，库平三钱六分’，币面分为唐头侧像和正像两个版式，但是后者成色为80%” [11]。到了靖国军兴，则同一版式的半开银币“由八成降至七成、六成乃至五成，甚至不足五成” [11]，到了1932年，铸造的“双旗”半开银币“重13.4克，成色41%，币面书‘云南省造半元银币库平三钱六分’” [11]。可见无论铸币含银多少、重多少，它“被规定”等于库平银三钱六分。那就是“统治者凭借其至高无上的权力而要求的归政府所有的收入”。

有了这些收入，富滇银行便有恃无恐。1914年外交部特派员张翼枢向富滇银行报告东方汇理已经进入了个旧贷款汇兑市场，并建议富滇银行也经营滇港汇兑业务：“其（指东方汇理）卖货收款及退还余款与商人之法，银行必有所知”，意指东方汇理是在香港出售了锡矿的汇票后才付给锡商贷款的，并且只是一部分，其余的等款到银行再向锡商结清余款，并不会占用很大的资金。“查个旧锡务自开矿炼砂为厂主需款时期，至大锡出口销售，则为锡商汇兑时期。中国及富滇银行若能贷款并事汇兑，其条件即不优于汇理银行，然能与之同等以便竞争……且中国富滇银行从事贷款可受不动产为抵押（意指传统的个人信用担保贷款，这一直被认为是本地银行的专属）。汇理则否，此又中国人所设银行之胜著也。” [12] 但是富滇银行放弃了此项业务，盛延龄行长在复信中认为货

币业务已能够为富滇银行带来很大的盈利,就不必进入商业银行业务了:“由香港购运银条回滇,铸造银币.....若能达目的,将见本银行业务日益扩张,而东方汇理银行虽欲竭力吸收我滇银币,亦无益也” [12]。而这仅仅是铸币,推及纸币将更加惊人。

三、财政与金融的平衡木

但是货币发行并非如此简单的赚钱机器,它可以为政府带来源源不断的利润,但同时也少不了成本极高的维护,这个成本就只有从财政中来。早在19世纪后期,西方主要国家都禁止了银币的自由铸造,从而进入了金本位时代,从此以后,白银只在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被作为货币,白银价格于是一路下跌。并且由此人们很肯定地认为,白银价格还会跌下去,至少是涨不起来的。在这个背景下,盛廷龄行长的这套理论行得通,从香港以低价购回白银,回滇铸币,稳收铸币之利,同时,滇币纸币和银币半开的兑换价格是绑定的,如果市场预期白银价格要跌,那么滇币就有了一定保值功能,白银价格越跌,市场持有滇币的热情就越高,滇币的市值也越高。于是,就出现了民国八年(1919年)以前“纸币信用既固,以硬货兑换者,因供不应求,尚须贴水” [13]。同时,汇价也高,“当时(民国八年以前)由滇汇往外埠,每百元仅需滇币九十二三元,由外埠汇入滇省,则须贴水十五元左右” [13]。滇币和半开银币都供不应求,富滇银行当然就高枕无忧,且不屑于从事商业银行业务了。但是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因为国际金价持续超跌,银对于金价就有了上涨的势头,“民国二年二月,越南政府禁止银运出境.....民国五年香港银价大涨,下令禁银出口,云南银币来源完全断绝” [14]。同期,由于国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进入衰退,对大锡等工业原料的需求锐减,而滇币币值的高迄也更加支持进口而非出口,云南出口由出超迅速转为入超,也使云南的白银储量大大减少。“唯本省金融变态,尚有其最大原因,即硬货外溢与入超剧增也” [13]。一旦无法购入廉价白银,云南的货币体系就濒临“变态”。而由于云南金融的特殊性质,遇到困难的金融当然求助于财政。但此时的云南金融与财政就像是被分置于平衡木的两端,不是倒向此就是倒向彼,而无法找到平衡。

1917年,此时滇省内的白银和银币已经被大量搜运出境,省内感到银根吃紧,唐继尧于当年4月21日密令财政厅长:“惟个蒙市面银荒不能不设法救济。现在惟有多方购集生银以加紧鼓铸” [12]。而当财政厅长吴琨与东方汇理银行商洽此事,提出“每广平生银一百两换大圆一百四十九枚,换半元三百零九枚” [12]时,东方汇理却不同意,以银价上涨为借口,要求“请换大元一百五十二枚,半元三百一十五枚” [12]。

财政救市,推高财政成本,加之省政府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财政一举陷入赤字。财政赤字,又要依赖银行救助。

1912 - 1929年云南财政收支情况表(单位:万元)

年份收入总数支出总数盈余数亏欠数

1912 (民元) 639 620 19

1913 (民二) 732 759 27

1914 (民三) 675 747 72

1915 (民四) 440 439 1

1916 (民五) 572 560 12

1917 (民六) 538 542 4

1918 (民七) 591 589 2

1919 (民八) 677 688 11

1920 (民九) 614 607 7

1921 (民十) 527 529 2

1922 (民十一) 397 649 252

1923 (民十二) 441 749 308

注：数据来自《云南省志经济综合志》第162页

富滇银行历年发行兑换券总额、银行应用数、政府借用数比较表

年度发行总额 银行应用数 政府借用数 数额指数 数额百分比 数额百分比

民国元年

二年 600000 100 600000 100 0

三年 3100000 517 3100000 100 0

四年 4100000 683 4100000 100 0

五年 4000000 667 3200000 80 800000 20

六年 5000000 833 3900000 78 1100000 22

七年 5400000 900 4100000 76 1300000 24

八年 6500000 1083 4900000 75 1600000 25

九年 5500000 917 3900000 71 1600000 29

十年 6200000 1033 4000000 65 2200000 35

十一年 9000000 1500 5900000 66 3100000 34

十二年 15400000 2567 6000000 39 9400000 61

十三年21700000 3617 8400000 39 13300000 61

十四年26200000 4367 6400000 25 19800000 75

十五年38600000 6433 9200000 24 29400000 76

注：1、此表数据源自：万湘 《云南对外贸易概观》新云南丛书1946年版第183页。

2、表中发行总额指数部分为本文根据原数据计算得来，基期规定为民国二年。

3、原表说明：“1、本表根据云南富滇总银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发行兑换券统计表及云南省政府借用兑换券与银行营业应用兑换券比较表改制而成，十万元以下的数字原表从略；2、富行会计年度，系自上年七月起，自次年六月三十日止，故民国元年九月至十二月发行数，系属民国二年会计年度”。

民国九年，富滇银行成立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挤兑，并且富滇银行采取了暂时性的限制汇兑政策，唐继尧政府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于是命财政厅长徐之琛、富滇银行行长詹秉忠草拟整理金融的办法，徐和詹的《整理金融忌见书》总共列了十八条办法，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动用财政储备，购买生银及其他铸料，加紧铸币以满足兑换，从而起到平缓局势，消除挤兑的作用。二是为了增加信心，政府以法令形式规定纸币的通行效力(税收全用纸币)，同时规定纸币与银币的兑换价格保持不变。三是为了筹集到更多资金购买铸料，政府削减开支、银行紧缩银根、限制现金外流 [15]。

紧缩银根，可以提振币值，拯救金融，但却必定伤害财政，且不谈“动用财政购买生银”这样直接的财政支出。龙云时代所编的《云南行政纪实》中也批评这样一味靠紧缩银根提振货币的办法，最终将得不偿失：“例如本省主要出口产品以大锡一项而论，……滇币低落已非一日，出口商之生产成本系以低值滇币为本位，今以紧缩方式提高滇币则外汇汇率势必低落，出口商所得外汇金额虽不变动而换得滇币数目则已减少，势必亏折停闭出口贸易，贸易既不发达，外汇来源愈更稀少……财政收入势必大受影响。此不啻意在维持金融而实则妨碍经济……故收效甚微” [1] 财政赤字严重，政府开支就乏力，唐继尧曾在民国十五年的一次会议中，表示对军费的激增感到很不解，说：“余由黔回滇后每月军费不过二十八万余元，后因国家多故，增两混成旅，亦不过三十万元，护国军兴，湘、粤、川三路出兵，每月亦不过四十万元……直至内部政变以后，军费骤增至一百一十余万元。嗣后虽竭力收缩，每月支出仍在在一百一十余万元” [16]。财政实在乏力就诱使政府开动印钞机来弥补，这是金融救济财政。

富滇银行发行兑换券与政府积欠比较表

时间发行兑换券总额政府积欠总额营业运用数

民国十一年五月底8860000 3090000 5770000

民国十二年五月底14820000 8570000 6250000

民国十三年五月底21920000 12190000 9730000

民国十四年五月底25690000 19270000 6420000

民国十五年五月底37500000 28900000 8600000

注：1、此表源自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金融所编《云南富滇银行-云南富滇新银行历史资料汇编》（上）第119页。

2、原表注：“本表系根据银行发行兑换券日记帐及政府往来帐每年五月底总结实数填制，万元以下之尾数均从略。富滇银行会办刘志道谨识”。

滥发纸币的结果是财政和金融的两败俱伤。但当时的政府没有更多的手段解决，只能把平衡木再压向另一端。民国十五年六月唐继尧再次召集云南金融会议，“会议结果，决定所有税课加征一倍，以两年为限，即将增加所得之款，专为收毁纸币，清偿政府积欠富行二千五百万元宿债之用，并规定自两年后，第一年起，所有全省收入税款，分期摊还，每年按未加以前旧额减收一成，推至第二十年止，田赋、锡税两项，则规定条例名为‘云南整理金融随粮公债’和‘云南整理金

融锡税公债’” [14]。可见，会议的决定是量财政之力，收回并销毁纸币，用财政拯救金融。财政和金融的跷跷板又倒向了金融一边。

结 论

中国近代的银行和金融与财政之间的联系是刚性的，它们多数都应财政之需而生，借助财政发展，也因为过度借款给政府、投资财政而饱受危机或倒闭之苦。但是，仅仅用“刚性联系”来形容富滇银行与唐继尧政府的关系是不够的，承担货币发行任务的富滇银行，全资属于云南省政府，几乎可以说是政府机关之一。富滇银行与财政的关系不是刚性的，它们是左手和右手，手心和手背。富滇银行没有像内地华资银行那样，“在20世纪，现代化的银行确实迅速地发展了起来，部分的原因是政府的赤字” [17]；而云南政府也不能像北京，或南京政府那样：“单一银行，借款于政府，如果有利，政府以为示大恩于我，希图常借，如成呆滞，区区一银行之苦乐，辄不在政府之心目中” [18]杨小凯认为，“军阀割据也产生了类似欧洲政治不统一的好效果，制度试验多样化增加” [19]，富滇银行的特殊性质即是唐继尧政权统治下，金融制度多样化的一个试验。经过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的金融和财政危机，云南的财政和金融将猛醒，在云南的金融体制下，不存在谁依赖谁，谁倾轧谁的可能。云南的财政和金融如果不想一起失败，就必须一起成功。

参考文献：

[1] 喻宗泽. 云南行政纪实[Z]. 云南省财政厅印刷局, 1943.

[2] 开设富滇银行(一) [A]. 云南实业科档案(77 - 6 - 377卷) [C].

[3] 龙云, 卢汉修, 周宗岳, 等. 新纂云南通志[Z]. 1949.

[4] 大中华云南军都督府军政部札(1911年11 月24日) [A]. 云南省政府秘书处档案(106 - 4 - 1597卷) [C].

- [5] 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金融所. 云南富滇银行——云南富滇新银行历史资料汇编(上) [Z].
- [6] 云南实业司总务科档案(77 - 5 - 150卷) [Z].
- [7] 云南实业司总务科档案(77 - 5 - 150卷) [Z].
- [8] 兰日旭. 中国金融现代化之路——以近代中国商业银行盈利性分析为中心[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9] 申报, 1923 - 5 - 28.
- [10] [美] 约翰. F. 乔恩. 货币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11] 昆明市金融志编撰委员会. 昆明市金融志[Z].
- [12] 云南省档案馆, 云南省经济研究所. 云南近代金融档案史料汇编(第一辑(上)) [Z]. 1992.
- [13] 民国云南省通志馆. 续云南通志长编[Z]. 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 1985.
- [14] 万湘 . 云南对外贸易概观[M]. 新云南丛书, 1946.
- [15] 云南省政府秘书处档案(106 - 4 - 1692卷) [Z].
- [16] 张肖梅. 云南经济[M]. 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 1942.
- [17] [美] 小科布尔. 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 - 1937) [M]. 杨希孟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 [18] 张东刚. 世界经济体制下的民国时期经济[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5.
- [19] 杨小凯. 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M].

文章来源: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责任编辑: x1)